

# 美国对华政策

(1944—1945)

〔美〕约·斯·谢伟思著 王 益 王昭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82

10

# 美国对华政策

DH73/20 (1944—1945)

《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

[美]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 著

王 益 王昭明 译

马德麟 杨云若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梅筠 黄小玲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王增寅

版式设计：李玲玲

## 美国对华政策

(1944—19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1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册

ISBN 7-5004-0103-5/D·4 定价：3.60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著者约翰·谢伟思以当事人身份，通过揭露著名的“美亚杂志事件”的真相，论述了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演变、实施及其后果，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一些内幕；详尽地介绍了在延安、华北等根据地实地考察的情况，如实记录了他与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的谈话。史料翔实，论述较为客观，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均有参考价值。

## 译者的话

在中美关系史上，抗日战争后期是一个关键性时期。美国政府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它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个迄今仍在争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后来中美关系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为何失败、美中为何对立等的不同看法。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就成了研究中美关系和中国现代史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众多论著中，本书是值得一读的著作之一。

本书作者约翰·谢伟思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人物，他是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出生于成都，青少年时代的16个春秋是在中国度过的。抗战时期，他是美国驻华外交官，历任领事馆、大使馆职员、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和赴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由于他谙熟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中国的情况有深刻了解，因此，他对当时中国的形势有独立的见解，撰写了许多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建议。为此，他被赫尔利和麦卡锡等人视为嫌疑分子，遭到政治迫害。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1971年，谢伟思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加入了第一批来华访问者的行列，并两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部书是谢伟思回顾他所经历的中美关系史的第一部论著，其中引用了大量他本人保存的第一手史料，有些在这里是第一次发表；在这部书中，既有作者当时真切的实际感受，又有事后成熟的明智判断。

作者写这部书的直接动机是批驳达拉斯大学历史教授库比克博士的《美亚文件》一书。该书于1970年发表，是为适应美国反动势力企图阻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而抛出的。书中编辑发表了1945年麦卡锡时代查抄《美亚》杂志社时搜出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写的许多报告，其中许多出自谢伟思之手。库比克在该书中断言，1949年美国“丢失了中国”其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破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其中当然包括谢伟思。

谢伟思在本书中介绍了《美亚》杂志事件的始末，揭露了这是一场麦卡锡主义的阴谋；并详细阐述了1944年至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作者认为，该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不象赫尔利和库比克所理解的那样，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相反，一系列美国政策文件表明，美国政府当时奉行的是“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灵活政策”。赫尔利没有执行美国政策的这一对华政策，他应该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作者从新的角度所作的这种解释，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对我们有所启发。此外，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作为当事人所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很有裨益。书中关于“美亚杂志案件”的论述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著名事件提供比较详细的材料。

本书译文由马德麟、杨云若同志校订。张注洪、高望之、黄小玲同志对译文的修改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邵本兴

同志也给过一些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曾梅筠同志对本书译文的修改、编辑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致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可能有不妥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 作者致谢..... | ( 7 ) |

## 第一编 《美亚》杂志案件.....( 10 )

|                      |        |
|----------------------|--------|
| 第一章 何谓“美亚文件”？.....   | ( 10 ) |
| 选择靶子.....            | ( 12 ) |
| 文件是偷窃的吗？.....        | ( 16 ) |
| 文件具有外交意义吗？.....      | ( 22 ) |
| 第二章 何谓《美亚》杂志案件？..... | ( 26 ) |
| 假定有罪.....            | ( 30 ) |
| 这是一个奇怪的案件吗？.....     | ( 33 ) |
| 挑选出的事实.....          | ( 58 ) |

## 第二编 1944至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62 )

|                       |        |
|-----------------------|--------|
| 第二编 导言.....           | ( 62 ) |
| 第三章 通过美国的指挥权统一中国..... | ( 64 ) |
| 失败之果.....             | ( 73 ) |
| 第四章 高斯大使提出中立性建议.....  | ( 78 ) |
| 华盛顿的推动.....           | ( 80 ) |

|                                            |        |
|--------------------------------------------|--------|
| 蒋介石的拒绝·····                                | ( 83 ) |
| 更多的失败之果·····                               | ( 86 ) |
| 第五章 赫尔利将军支持蒋介石·····                        | ( 89 ) |
| 新大使·····                                   | ( 91 ) |
| 一个新姿态·····                                 | ( 95 ) |
| 掌握在斯大林手中·····                              | (104)  |
| 美国人“一致行动”·····                             | (109)  |
| 再次失败·····                                  | (115)  |
| 第六章 华盛顿坚持灵活政策·····                         | (117)  |
| 对中国而不是对国民党承担义务·····                        | (121)  |
| 赫尔利陈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理解·····                     | (123)  |
| 重申灵活政策·····                                | (129)  |
| 不要对委员长发号施令·····                            | (133)  |
| 也不要承担义务·····                               | (146)  |
| 马歇尔继续奉行有条件支持的政策·····                       | (152)  |
| 第七章 来自现场的遭到否定的观点·····                      | (173)  |
| 在重庆发表的观点·····                              | (177)  |
| 在延安发表的观点·····                              | (185)  |
| 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中有地位吗? ·····                      | (211)  |
| 在中国, 回答是否定的·····                           | (243)  |
| 附录一 发自延安和重庆的报告的一览表·····                    | (255)  |
| 附录二 中国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br>( 1944年6月20日 ) ····· | (265)  |
| 附录三 参考文献目录·····                            | (291)  |
| 附录四 译名对照表·····                             | (301)  |

##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远东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是由于美国政府在战争最后一年作出的某些决定（或者说，实际上是由于回避作出某些决定）造成的。1944年，日军成功地袭击了在蒋介石和克莱尔·陈纳德倡导下建立的那些未设防的中国机场，这使盟国看清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队未能保卫机场，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国民党虚弱腐败、内部互相倾轧，而共产党已掌握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些事实。人们发觉，对蒋介石一伙来说，国内的政治角逐远比保证继续坚持抗日战争更为重要。事实上，中国所有的主要派别都在为那场日本投降后必将爆发的内战作准备。美国不得不调整政策以对付——或者至少是使自己适应——已露端倪的局势。为此，它作了许多尝试。

美国首先试图把中国各派的武装力量置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指挥之下。这一企图由于蒋介石反对而告失败，结果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然后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试图调解国共之争，这一努力被证明是主观、愚蠢、不切实际的，它同样很快地失败了。赫尔利的调解努力建立在他曾不同程度地表示过的下列三点假设上，但这都是错误的假设：（一）蒋介石比共产党强大得多；（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三）即使未组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共产党或

国民党也可能单方或双方交出各自的某些军权。当调解的努力破产后，当时已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又做了两件造成灾难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错误的，另一件则是不光彩的。首先，他承诺美国只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唯一领袖；其次，他公开把自己发起的调停活动的失败归咎于美国驻华外交机构的全体中国问题专家，指责他们背叛美国，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准确地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他的调解为何不能成功。就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举行了，罗斯福逝世了，大战也结束了，而中国内战也就开始了。

巴巴拉·塔奇曼探讨了1944至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久前得出结论说：“中国是一个美国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维持现状的努力不能给一个衰败的政府提供力量和民众支持并帮助其巩固政权。它无法支撑一个徒具躯壳的政府，也不能长久地延缓天命的循环。好象美国人从未到来过一样，中国最终走了自己的路。”<sup>①</sup> 尽管我非常钦佩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但我认为，美国人不能把25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推诿于不可避免的“天命”。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没有各走各的路，相反，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战争，并从此彼此怀有敌意。美国也许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肯定有一个比当时实际推行的更好的政策。

美国当时的驻华外交官，包括本书的作者，曾提出过这样的政策。它包括努力防止中国爆发内战（比如，运用美国的影响改变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如果不成功，也不使美国 and 苏联各自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后台卷入中国的内战。然而，当时实际执行的是赫尔利大使的政策，它加速了中国内

---

① 《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1年版，第331页。

战的爆发（因为它取消了压蒋改革的政策），并驱使中共与苏联建立了十年之久的联盟，因为美国已与其敌人结盟。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且不说是悲剧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就是赫尔利非但没有为他执行的政策承担责任，相反，却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他的下属——具有数十年担任美国驻华代表经验的人们——把事情搞糟了。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着手寻找替罪羊时，他就把这些外交人员中伤为货真价实的卖国贼，何以认定这些外交官——他们都在1945年4月被赫尔利调离中国——负有“丢失中国”之罪，这始终是麦卡锡主义的一个谜。

我第一次遇到约翰·谢伟思是在1962年，当时他已由美国驻利物浦领事一职卸任而退出外交界，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的高级学位。我们初次相遇是在我教的美国远东政策课的课堂上，当时我刚提升为助理教授。在第一堂课上，我概述了要讨论的题目，并较为详细地谈到史迪威将军的赴华使命。课后，谢伟思走到我跟前作了自我介绍。当我确知他正是1944至1945年间“我国驻延安代表”约翰·谢伟思时，我只能喃喃而语：“很高兴认识你。我想回家准备关于史迪威的讲稿。”

约翰·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1933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担任驻昆明领事馆职员。由于他的汉语能说得象本国语言一样地道，他相继被委派在北平、上海、重庆任职，并于1943年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参谋。作为美国国务院派驻陆军的联络官，他在1944和1945年曾两次前往中共首都延安。1945年4月他被赫尔利调离中国，6月作为《美亚》杂志案件的嫌疑犯被捕。逮捕他显然是错误的，政府对《美亚》杂志最初的突然搜查发生在1945年3月11日，

而他是1945年4月12日才到达美国的。大陪审团以20：0票否決了对他的指控，这清楚证明谢伟思在这一事件中是无辜的。当我重读收在这部专著中的司法部关于这一轰动事件的报告时，产生了两点想法：（一）如果国务院聪明一些——它通常认为自己非常聪明，那么就该有某个官员对一位驻外多年刚刚回国的人告诫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美亚》杂志的成员；（二）司法部在这个案件中的严酷行径本身就值得国会对它进行一次调查。当然，《美亚》杂志案件的要害在于麦卡锡参议员想利用它来恫吓美国政府的某些高级官员。

在大陪审团宣布他无罪之后，谢伟思重回国务院工作，先是在东京任国务院派给麦克瑟阿将军的顾问班子成员，接着在新西兰的惠灵顿担任美国外交使团副团长。1950年3月14日，麦卡锡参议员在参院指控谢伟思，一年半后，尽管国会的调查证明他无罪，国务院仍将他辞退。1952—1957年，谢伟思在纽约一家蒸汽机制造公司工作（他在那里居然改进了一种蒸汽阀），并同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57年6月，法院一致投票判他无罪，9月，他回到国务院任职。1962年<sup>5</sup>月，他从国务院驻外处退休。

但他事实上并没有退休。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抱怨在30年后还得初次阅读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书），然后到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他以自己对中国无与伦比的知识帮助把该中心建成为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四、五个主要学术机构之一。他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努力将该中心图书馆建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收藏共产党中国资料的图书馆之一。

从1952—1970年整个这段时期中，谢伟思都克制着不在关于中国政治的公众讨论和学术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虽

然研究延安时期问题的学者们多次要求他这样做。他在1970年决定打破沉默，虽然这是由于官方对他再次进行攻击而不幸引起，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美国政府、国会和公民50年代初对待战时驻华官员们的那种行径，也许可以找到某些辩解之辞。如当时冷战正又一次进入高潮阶段，人们感到困惑和不安，在追究所发生的事情的缘故时，美国人重演了波斯将军杀害报忧信使的古老悲剧。

但是在1970年重演这些事件，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了。正如《纽约时报》1970年2月15日指出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出版《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一书，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内部和台湾方面的“院外驻华集团”残余分子想阻挠中美关系改善的拙劣企图，在当时来说，就是要干扰刚刚恢复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华沙进行的大使级谈判。这次院外活动选择的人身攻击方式，与几年前由台湾发动的对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诽谤运动相类似。<sup>①</sup>达拉斯大学历史教授安东尼·库比克博士为《美亚文件》所写的113页的导言，不仅是一份不光彩的学术文章，而且明显地出于宣传动机，以至于他在台北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还得到蒋介石本人的赞赏（见1970年3月21日《纽约时报》）。美国的纳税人可以提出合理的询问：美国参议院怎么会为他这种活动充当了出版商？

但是，正如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在两卷本《美亚文件》的前言中指出的：“出版这部书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它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部有价值的基本史料书。”撇开库比克的导言不谈，我确信伊斯特兰参议员的这个判断是正确

---

<sup>①</sup> 参看伦纳德·戈登和张树兴《费正清和中华民国批评他的人》，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1期，1970年11月，第137—143页。

的。今后许多年中，历史学家们将查阅美国外交官员的这些报告，它们中有许多是在这里初次发表的。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政治上至为关键的十年，在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种语言的资料中，这些文件可能是唯一最为重要的史料。对于想研究这些报告的历史学家，以及仅仅对它们怪异的标题和奇特的出版者感到好奇的学者来说，谢伟思的专著将成为阅读这些报告的必不可少的指南。不言而喻，这本专著的作者和来自重庆、延安的大部分报告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从他事前和事后的见解中得到教益。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查默斯·约翰逊

1971年4月于伯克利

## 作者致谢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大量帮助。我感谢中国战争年代的许多老伙伴，特别是约翰·K·埃默森、富尔顿·弗里曼、约翰·F·梅尔比和戴维·D·包瑞德上校，他们欣然向我提供了有关的回忆和事实。我深深地感谢亲身经历过此书涉及之事的很多往日国务院的同僚们。他们包括O·埃德蒙·克拉布、约翰·P·戴维斯、雷蒙德·P·卢登、爱德华·E·赖斯、菲利普·D·斯普劳斯和约翰·卡特·文森特。他们审阅了第二编文稿，并提供了有见地的建议和重要指正。我特别有幸能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查默斯·A·约翰逊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莱曼·P·范斯莱克教授的类似帮助。他们作为学者而不是事件参加者阅读了文稿，提出了大量深思熟虑的评论，由于具有充分客观而透彻的见解，这些评论很有价值。然而，我必须强调指出，此处提到的人大概没有一个完全同意我在此书中所写的一切。书中的论述、结论和错误均由我本人负责。

埃德加·斯诺慷慨地允许我摘引他的《复始之旅》。我们同样感谢邹谠教授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我摘引《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乔治亚娜·史蒂文斯允许我使用她已故丈夫哈利·史蒂文斯上校的珍贵文件，史蒂文斯上校1945年间任战略情报局驻重庆代表时是我的朋友。简·凯尼柯小

姐作为一个富有耐心、乐于效力的熟练打字员，她所作的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职责范围。因为没有作者能同时胜任自己著作的编辑工作，所以乔·皮尔逊夫人的帮助，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最后，我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没有它的帮助，此书不可能问世。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的退休生活提供了一个令人惬意和振奋的工作机会，使我在被迫长期脱离中国工作之后，又重新接触到这个具有永久吸引力和重要性的题目，尽管工作性质不同了。库比克博士对聘用我一事所作的批评（见《美亚文件》第70页）并不是这类批评中的第一个，它们都未能恐吓住该中心和它从属于的这所伟大的大学。

还应提及另一项帮助。虽然我厌恶库比克博士和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我的报告所做的编排和评论，我还是很高兴在25年之后又得到了至今才可寻及的我自己的报告。读者看本书第一编时将会注意到，在官方准许的情况下，我本人曾保存了一套报告的副本。司法部1945年把这套副本还给我后，因为我接着就被派往日本工作，我把它们交给了国务院中国科。1950年我在忠诚安全委员会和泰丁斯委员会受审时，我的律师和我本人都认为，反驳某些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使用我的报告原文。但是中国科那时已把我的报告的副本丢失，再也不可能重新收集起这样完整的一套文件。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为我辩护所需的“证据”一直还在那里，作为被扣留的我的私人文件由司法部锁着，以待最终异想天开地把它们作为“中国灾难的线索”加以公布。

1951年12月，华盛顿的所有报纸都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我因忠诚可疑被解除外交官职务的新闻。那天，我妻子和我建议我们上中学的两个大孩子不妨在一两天内不去上学。他们